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

尹志超 张 安

内容提要:中国农村家庭面临不可忽视的财务风险,劳动力流动是家庭提升风险应对能力的有效手段。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会显著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通过分解财务脆弱性这一指标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总收入、无风险金融资产和预期支出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家庭非预期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流动会通过增加就业数量和提升就业质量来改善家庭财务状况。具体地,劳动力流动从工资率、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三个维度来提升农村家庭就业质量,进而降低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对低人力资本家庭、低社会资本家庭和低物质资本家庭的财务脆弱性存在更大的缓解作用。对于面临赡养老人和偿债压力的家庭而言,劳动力流动在维持家庭健康财务状况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研究还发现,相较于县内流动,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的家庭财务脆弱性更低。相比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为防范化解中国农村家庭经济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控制经济风险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就业数量 就业质量 财务脆弱性

作者简介:尹志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100070;

张 安(通讯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100070。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5)01-0081-18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近年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整个市场正常运行面临巨大风险挑战。作为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经济风险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深刻影响。在实现全面脱贫背景下,防止“因病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家庭经济风险测度、成因及外溢性研究”(21&ZD087)。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张安电子邮箱:zhang_an2021@163.com。

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点关注的风险问题。从财务状况来看,农村居民普遍金融素养和劳动技能水平偏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加上季节性和摩擦性失业时有发生,一旦外生冲击造成意外损失,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将会提高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的概率,导致农村家庭发生返贫风险。因此,基于家庭财务状况研究家庭经济风险,对严防家庭财务脆弱问题引致居民部门发生系统性风险,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教育、医疗、户籍等制度深层次变革,不断为劳动力社会性流动破除障碍。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取消农业和非农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有序引导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实现人口自由迁移流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强调,要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人口流动限制的不断消解,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劳动力流动俨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农民工规模为2.25亿人,2022年增长至2.96亿人。整体来看,外出农民工占总体农民工的比例基本在60%左右。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来看,2014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108元,超过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502元,而2022年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多1214元。^①长期而言,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呈上升趋势,但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随着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和就业质量发生了深刻变革。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产业兴起,工作任务的复杂程度催生新业态、新职业的出现。农民工不再局限于建筑业、制造业等高危行业(崔岩、黄永亮,2023),物流、外卖等新兴行业也存在大量农民工的身影。不论是外卖骑手等新兴职业的出现,还是网络直播带货与传统商务模式深度融合,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得到显著提升。农民工自身劳动素质的提高以及就业需求结构的变革,导致农民工不再以劳动报酬为单一就业标准,社会保障、社会声望、发展前景、就业满意度、工作稳定性等指标也在就业考虑之内。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与工作任务难易程度之间的互补性促进了劳动力与工作岗位相互匹配(彭国华,2015),加速了高质量劳动力及其附载要素在空间与区域上的有效配置,对缓解地区经济差距、减少农村家庭贫困和降低收入不平等具有积极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8;Nguyen等,2011)。

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本文的创新点和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文从劳动力流动视角研究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丰富了已有相关文献。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医疗保险(岳崑等,2021)、金融素养(李建勇等,2021)、数字金融(赵亚雄、王修华,2022)等因素对家庭脆弱性的影响。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借助微观调查数据,从劳动力流动角度研究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有益补充了家庭经济风险的相关研究。(2)本文基于农民工就业视角探讨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机制。从就业数量来看,农民工在城市中务工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需求,还能充分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潜能,改善家庭财务状况,从而抵御家庭经济风险。从就业质量来看,农民工外出务工不仅会提高外出劳动力的小时薪资,增加获得社会保障的工作机会,还会拓展家庭成员的职业发展前景,不同维度的就业质量提升均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存在显著缓解作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还考察了家庭禀赋和压力负担等因素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异质性影响。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劳动力流动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

家庭效用和福利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包括制度政策、经济环境、文化制度、家庭禀赋等众多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张冀等,2016)。20世纪末,学术界引入脆弱性的概念对家庭效用和福利水平进行研究。家庭财务脆弱性被用来反映在考虑其他支出的情况下,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债务义务的不确定性(李波、朱太辉,2020),过度负债和流动性资产不足是财务脆弱性的两个重要特征(李建勇等,2021)。一方面,过度负债会增加居民的债务负担,引致家庭发生违约风险,从而使家庭陷入财务困境;另一方面,当家庭面临健康风险、死亡风险等意外事件冲击时,流动性资产不足或家庭资产无法处置变现也会增加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的概率。现有文献表明,家庭禀赋的积累和风险应对能力的提升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存在显著抑制作用。金融素养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家庭的风险识别和处理能力(李建勇等,2021)。岳崴等(2021)基于风险补偿视角研究发现,健康风险会增加家庭财务脆弱性,参与商业医疗保险能够缓解家庭财务风险。此外,加强社会网络关系、增加资产组合多样性等方式也是应对家庭经济风险的有效手段(章元、黄露露,2022)。

劳动力外出务工作为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对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具有积极影响。古典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个人收益最大化的自主和理性选择,迁移前后的预期收入差异是人口迁移的真实动因。“推拉理论”强调农业生产成本高、收益低,农村劳动力过剩,人地矛盾突出,就业机会不足等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流出的重要因素,城市的高社会保障、高福利水平,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等优势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关键拉动因素(盛来运,2005)。与传统理论假设个人决策主体不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为了实现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家庭会决定部分家庭成员进行外出务工(Stark, 1988)。一方面,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能够丰富家庭收入来源,减少对传统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规避家庭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外出务工可以打破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家庭信息获取成本,增强家庭金融和信贷服务可及性,进而有效缓解农村家庭财务风险。还有一些文献发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迁移能够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率(岳希明、罗楚亮,2010),对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和提升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8)。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增收效应来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

(二)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机制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保障农村家庭充分就业和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防范家庭经济风险的重要抓手。经济体制和流入地的选择决定着农民就业空间的容量(周其仁,1997),城市大量的就业机会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本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蓬勃发展的市场主体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劳动力流动打破了户籍制度的藩篱,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可达性进一步提升,提高了外出务工群体在城镇中的就业概率(盛来运,2005);另一方面,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新职业、新业态的涌现使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从信息搜寻视角来看,农村劳动力搜寻就业信息的成本大幅下降,劳动力与工作岗位的匹配效率明显提高。农民工群体不再局限于从事建筑业等低技能制造业,不论是外卖骑手等新兴职业的出现,还是网络直播带货与传统商务深度融合,都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择业空间(崔岩、黄永亮,2023)。同时,依托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数字平台可以优化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匹配机制(荆文君、孙宝文,2019),帮助农民工快速了解和满足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劳动需求,使务工家庭在城市兼职多份工作成为可能。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a。

假说 2a:劳动力流动通过增加农村家庭就业数量来缓解家庭财务脆弱性。

就业质量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工作时间、收入和福利、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和工作环境等多个指标(李中建、袁璐璐,2017)。随着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和就业市场的深刻变革,农民工群体不再只考虑工资性收入这单一因素,对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和工作满意度等就业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崔岩、黄永亮,2023)。现有研究认为,首先,工资薪酬是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直观体现(张广胜、王若男,2023),在考虑工作时间的的基础上,单位时间劳动报酬越高,劳动力的就业质量越高。其次,社会保障是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的重要拉力因素。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不仅能够增加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减轻家庭在医疗、工伤、失业等风险冲击下的经济负担,降低家庭经济风险造成的财务损失,还有助于外出劳动力获得与城镇职工同质的均等化公共服务,为农民工在城市立足和举家迁移,实现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提供物质保障(佟大建等,2022)。从职业发展来看,个体职业发展状况是家庭从候鸟式迁移向永久迁移转变的基础。随着农民工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就业市场结构的深刻变革,农民工在完成市民化的过程中逐渐接受认同自身的城市身份,并在职业选择中由工作环境差、工资水平低的职业转向中高收入职业(盖庆恩等,2024)。只有在家庭职业发展状况较好的条件下,农民工才能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最终在城市定居成为城市居民(魏万青,2015)。此外,家庭成员职业发展状况与家庭整体财务状况紧密相关。个体职业发展状况越好、越稳定,外出劳动力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越高,家庭整体财务状况越健康。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b。

假说 2b:劳动力流动通过提升农村家庭就业质量来抵御家庭财务风险。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基于研究问题,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统计了家庭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保险与保障、户籍地等方面的微观信息,样本的覆盖范围广,满足采集样本的随机性。本文以 2015—2019 年的调查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及户主年龄小于 18 岁的家庭样本;(2)剔除家庭中不存在适龄劳动力的样本,包括家庭成员全部属于离休或退休、丧失劳动能力、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失业或没有找到工作等非劳动力范畴样本;(3)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家庭总资产进行上下 1% 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

为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非线性计量模型:

$$Fragile_{it}^* = \alpha + \beta_1 Migration_{it} + \gamma X_{it} + \lambda_p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Fragile_{it} = 1(Fragile_{it}^* > 0) \quad (2)$$

其中, $Fragile_{it}$ 为虚拟变量,当家庭 i 在 t 年陷入财务脆弱时,取值为 1;当家庭 i 在 t 年没有陷

入财务脆弱时,取值为0。核心解释变量 $Migration_{it}$ 代表家庭 i 在 t 年发生劳动力流动。 X_{it} 表示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层面和户主层面的特征变量。 λ_p 是省份固定效应, $year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是不可观测的误差项。考虑到家庭劳动力规模的差异,本文还考察了劳动力流动人数 $Migration_Num_{it}$ 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家庭财务脆弱性。参考 Brunetti 等(2016)、李波和朱太辉(2020)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定义,这里引入“财务保证金”来测度家庭财务脆弱性,并将其界定为家庭在满足日常生活成本、债务支付等预期支出和医疗支出等非预期支出后的财务剩余,表达式如下:

$$FM_{it} = Y_{it} + LA_{it} - EE_{it} - UE_{it} \quad (3)$$

$$EE_{it} = CL_{it} + DP_{it} \quad (4)$$

其中, i 表示家庭, t 表示年份; FM_{it} 为家庭 i 在 t 年受到冲击后的“财务保证金”; Y_{it} 表示家庭总收入; LA_{it} 表示家庭能够迅速变现的无风险金融资产,包括家庭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 EE_{it} 表示家庭的预期支出, CL_{it} 和 DP_{it} 分别代表家庭预期的生活成本和债务支出,包括消费性支出、房贷支出等; UE_{it} 表示家庭非预期支出,即家庭的医疗与耐用品修复支出等。

当家庭受到冲击后的总收入和无风险金融资产之和不能覆盖家庭的预期支出和非预期支出,即 $FM_{it} < 0$ 时,则认为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Pr(Fragile_{it} = 1) = Pr(FM_{it} < 0) \quad (5)$$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中是否有劳动力流动以及劳动力流动人数。参照贾男和马俊龙(2015)、陈媛媛和傅伟(2017)对劳动力流动的定义,本文根据个人户口所在地与常住地是否一致以及就业方式,针对16~70岁有工作的农村户籍人口对劳动力流动进行界定。如果家庭成员为农业户籍,户口所在地与常住地不一致,且在本乡镇之外从事非农就业,则定义为外出务工者;如果家庭成员为农业户籍,户口所在地与常住地一致,且在本乡镇从事非农就业,则定义为本地非农就业者;如果家庭成员为农业户籍,户口所在地与常住地一致,且在本乡镇从事农业生产,则定义为本地务农者。本文将家庭中存在外出务工者的家庭定义为劳动力流动家庭,赋值为1;不存在外出务工者的家庭,赋值为0。考虑到不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也会对家庭财务脆弱性产生影响,本文选取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代理变量。

3.机制变量

本文从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探讨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具体地,就业质量可以分为工资率、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三个维度。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问卷设计,借鉴肖伟等(2023)的做法,本文将家庭总工作数量作为农村家庭就业数量的代理变量。从就业质量来看,农村劳动力的工资率是就业质量的直接体现,本文使用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小时薪资来表示农村家庭的单位时间报酬(李博文等,2021)。除薪资报酬外,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和职业发展前景也是外出劳动力的重要关切点。本文将家庭劳动力中拥有“三险一金”的人数占比

作为社会保障的代理变量(仇化、尹志超,2023)。根据家庭中是否存在劳动力从事管理岗位来测度整个家庭的职业发展情况(陈博欧、张锦华,2021),如果家庭成员是党政和国家机关、群团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或者雇主,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 控制变量

参照尹志超等(2020)的做法,本文从户主和家庭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100、男性、已婚、受教育年限、自评健康状况等,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少儿抚养比、老年人占比、拥有自有住房、拥有汽车、家庭负债、参与养老保险、参与医疗保险、家庭经营工商业、家庭总资产取对数等。具体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财务脆弱性	家庭财务保证金<0取值为1;否则,为0	0.4011	0.4901	0	1
劳动力流动	家庭存在劳动力流动取值为1;否则,为0	0.2446	0.4299	0	1
劳动力流动人数	家庭外出劳动力流动的人数	0.3770	0.7505	0	6
就业数量	家庭劳动力的总工作数量	2.3152	1.1129	1	9
工资率	家庭劳动力平均小时薪资取对数	2.5953	0.7755	0.0790	4.5320
社会保障	拥有“三险一金”的人数/家庭劳动力总数	0.1093	0.2749	0	1
职业发展	家庭有人从事管理岗位取值为1;否则,为0	0.1146	0.3185	0	1
户主年龄	户主的年龄	50.4642	11.0265	18	70
户主年龄平方项	户主年龄的平方除以100	26.6821	10.8057	3.2400	49
男性	户主为男性取值为1;否则,为0	0.8775	0.3279	0	1
已婚	户主已婚取值为1;否则,为0	0.9088	0.2879	0	1
受教育年限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8.0979	3.2909	0	22
自评健康状况	户主自评健康得分	2.6226	0.9869	1	5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数	3.7491	1.6758	1	20
少儿抚养比	14岁以下儿童数量/家庭总人数	0.1275	0.1672	0	0.8333
老年人占比	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家庭总人数	0.0976	0.2141	0	1
拥有自有住房	拥有自有住房取值为1;否则,为0	0.9357	0.2453	0	1
拥有汽车	拥有汽车取值为1;否则,为0	0.2311	0.4216	0	1
参与养老保险	家庭有人参与养老保险取值为1;否则,为0	0.8140	0.3891	0	1
参与医疗保险	家庭有人参与医疗保险取值为1;否则,为0	0.9559	0.2054	0	1
经营工商业	家庭经营工商业取值为1;否则,为0	0.1772	0.3818	0	1
家庭负债	家庭存在负债取值为1,否则,为0	0.4070	0.4913	0	1
家庭总资产	家庭总资产取对数	12.3069	1.4232	8.4397	15.5287
人均受教育年限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8.0857	3.0648	0	22
礼金收支	家庭礼金收支的总和取对数	5.7972	3.6277	0	10.5967
赡养老人	家庭存在老年人取值为1;否则,为0	0.2484	0.4321	0	1
过度负债	资产负债率高于50%取值为1;否则,为0	0.0762	0.2652	0	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劳动力流动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基准回归结果。表2第(1)、(2)列是使用OLS模型的回归结果,第(3)、(4)列报告了使用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家庭财务脆弱性对劳动力流动及劳动力流动人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劳动力流动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存在显著抑制作用。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家庭财务脆弱性也会逐渐降低。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与风险防范意识有关。受教育年限越长,风险防范意识越强,资产组合更加合理,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就会越低。在健康程度方面,户主健康水平较低的家庭,更容易陷入家庭财务困境,这与岳崑等(2021)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家庭禀赋方面,家庭规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财务状况存在显著改善作用。从人口结构来看,少儿数量越多,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面临的健康风险可能越大,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也就越高。进一步分解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指标发现,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来缓解家庭财务风险。^①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劳动力流动	-0.1028*** (0.0056)		-0.1038*** (0.0058)	
劳动力流动人数		-0.0595*** (0.0031)		-0.0621*** (0.00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455	42455	42455	42455
R ²	0.0963	0.0967	0.0754	0.0758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内列(3)、列(4)为变量的边际效应。下同。

(二)内生性分析

尽管在模型中尽可能控制影响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特征变量,但实证模型中仍然可能因为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问题而存在估计偏误。就遗漏变量而言,家庭成员的性格特征不仅会影响家庭的外出务工决策,还会影响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进而影响家庭财务脆弱性。就反向因果问题而言,家庭财务越脆弱的家庭,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愿望更加强烈,有更大概率选择外出务工。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尹志超等(2020),选取同一村庄同一收入阶层其他家庭的劳动力流动比例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表3报告了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影响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估计结果。表3第(1)列和第(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对农

① 限于篇幅,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分指标对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结果未在正文中报告,留存备索。

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存在显著改善作用。两阶段估计中,第一阶段估计的F值分别为474.19和247.39,大于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Stock和Yogo,2005),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于核心解释变量为二元虚拟变量,IV-Probit模型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因此本文使用Eprobit方法进行估计(葛永波、陈虹宇,2022)。表3第(3)列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劳动力流动与残差项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模型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是合理的。表3第(4)列汇报了使用IV-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对缓解家庭财务脆弱风险具有积极影响。

表3 内生性分析:工具变量法

	(1)	(2)	(3)	(4)
劳动力流动	-0.4302*** (0.0167)		-0.3488*** (0.0134)	
劳动力流动人数		-0.2402*** (0.0095)		-0.2443*** (0.01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455	42455	42455	42455
R ²	0.0286	0.0317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更换数据集、更换变量定义、更换计量模型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①

1. 更换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为避免问卷调查数据库差异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尹志超等(2020)中对劳动力流动的定义,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的概率。相对于无劳动力流动的家庭,劳动力流动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更低。更换数据样本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2. 替换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定义方式

考虑到资产的流动性和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岳崑等(2021)将家庭财务状况分为财务自由、财务脆弱、过度消费但具有流动性和财务约束四种情形。本文将家庭财务脆弱和财务约束这两种财务状况定义为财务恶化,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家庭财务恶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劳动力流动人数后,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对家庭财务状况也存在显著改善作用,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3. 剔除城镇地区的农民工样本

由于数据匹配时保留的是家庭中有农村户籍的样本,并未考虑所调查的家庭是在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为避免城镇地区的农民工样本对回归结果产生估计偏误,本文选择剔除调查样本为城镇地区的农村户籍家庭,只保留调查地区为农村地区的家庭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

^① 受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报告,留存备案。

示,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规模对家庭财务脆弱性都存在显著降低作用,研究结论保持稳健。

4.使用Logit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为避免模型和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本文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劳动力流动以及家庭外出务工规模的扩大都会明显改善家庭财务状况,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五、机制检验:基于农民工就业视角

(一)劳动力流动、就业数量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从劳动需求角度来看,就业形态变革和数字化转型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科技进步引起的城市经济增长会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姜鹏飞等,2024)。同时,依托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数字平台可以提高劳动力和企业单位之间的供需匹配效率(荆文君、孙宝文,2019),使农民工快速了解不同职业的就业标准。农民工在搜寻工作和匹配技能的过程中,劳动力流动能够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缓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容易在城镇寻找工作,获取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择业空间(盛来运,2005)。这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为城市和企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还会为农村劳动力实现财富积累提供就业可能。本文借鉴肖伟等(2023)的做法,使用家庭总工作数量代表农村劳动力就业数量的获取情况。受数据限制,本部分使用2015—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①表4汇报了劳动力流动、就业数量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获取工作的可能性。表4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工作数量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能够通过多打几份工来实现财富积累,从而增强家庭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

表 4
 劳动力流动、就业数量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变量	(1)	(2)	(3)
	工作数量	工作数量	家庭财务脆弱性
劳动力流动	0.2032*** (0.0137)		
劳动力流动人数		0.2015*** (0.0069)	
工作数量			-0.0795*** (0.00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8723	28723	28723
R ²	0.3595	0.3710	0.1007

① 2019年CHFS中只询问了家庭成员除主要工作外是否还有其他工作,但并未提及其他工作的数量。因此,本部分使用2015—2017年CHFS进行回归分析。

(二)劳动力流动、工资率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农民工是农村家庭走向城市,由农村劳动力向职业工人转变的特殊群体。从劳动供给视角来看,基于农民传统的家庭责任和城市较高的生存成本,农民工会以增加家庭收入为主要目标而增强对工作时间的忍耐(刘林平等,2010)。预防性劳动供给理论认为,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也会使个人增加劳动时间以规避不确定性风险(Low,2005)。为考察劳动力流动、工资率与家庭财务脆弱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借鉴李博文等(2021)的做法,使用家庭劳动力平均小时薪资的对数来测度农村劳动力的单位时间报酬。由于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调查问卷中没有询问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时间,本部分剔除家庭劳动力全部为本地务农者的家庭,保留本地农民工家庭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表5回归结果显示,相比本地农民工家庭,外出农民工能够通过提高单位时间劳动报酬来缓解家庭财务脆弱性。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或地区工作时,往往需要面临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经济责任以及更高的生存成本。为了应对这种工作环境,外出劳动力需要选择更高工资率的工作岗位来获取劳动报酬,从而使农民工家庭降低财务脆弱性。

表5 劳动力流动、工资率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变量	(1)	(2)	(3)
	小时薪资	小时薪资	家庭财务脆弱性
劳动力流动	0.1030*** (0.0104)		
劳动力流动人数		0.0355*** (0.0056)	
小时薪资			-0.1308*** (0.00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450	24450	24450
R ²	0.1084	0.1063	0.1132

(三)劳动力流动、社会保障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在就业质量方面,良好的社会保障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拥有社会保障不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更稳定的劳动报酬,还能部分补偿不确定性冲击造成的风险损失,降低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另一方面,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也有助于外出劳动力获得与城镇职工相同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为考察劳动力流动、社会保障和家庭财务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仇化和尹志超(2023)的做法,将家庭劳动力中拥有“三险一金”的人数占比作为家庭社会保障的代理变量。表6汇报了劳动力流动、社会保障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相对于无劳动力流动家庭,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了家庭获得“三险一金”的可能性。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家庭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这表明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就业限制,使农村劳动力有机会进入社会保障更好的行业和用人单位,进而缓解家庭财务风险。

表 6
 劳动力流动、社会保障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变量	(1)	(2)	(3)
	“三险一金”占比	“三险一金”占比	家庭财务脆弱性
劳动力流动	0.0824*** (0.0033)		
劳动力流动人数		0.0412*** (0.0019)	
“三险一金”占比			-0.0673*** (0.009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455	42455	42455
R ²	0.2687	0.2658	0.0907

(四)劳动力流动、职业发展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随着新就业形态的蓬勃发展与农民工技能水平的不断提升,长远的职业发展也是劳动力择业时的重要标准。一方面,职业发展与未来预期收入相关。劳动力职业发展越好、越稳定,未来预期工资性收入越高(魏万青,2015),家庭抵御风险能力也就越强;另一方面,职业发展与社会网络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从现实经验来看,管理岗位的劳动者人际交往能力更强,在交流沟通、团队协作中具有相对优势,其积累的社会网络对家庭财务风险也存在一定缓解作用。为考察劳动力流动、职业发展和家庭财务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陈博欧和张锦华(2021)的做法,将从事管理岗位工作的职工家庭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表7汇报了劳动力流动、职业发展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估计结果。相对于无劳动力流动家庭,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进入管理岗位的概率,拓展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前景,管理岗位所附带的收入提高和权益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家庭财务风险存在缓解作用。

表 7
 劳动力流动、职业发展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变量	(1)	(2)	(3)
	管理岗位	管理岗位	家庭财务脆弱性
劳动力流动	0.0227*** (0.0035)		
劳动力流动人数		0.0142*** (0.0022)	
管理岗位			-0.0259*** (0.00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455	42455	42455
R ²	0.3689	0.3691	0.0898

六、异质性分析

不同家庭在禀赋特征方面存在天然差异,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就业决策受家庭生计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家庭禀赋和家庭压力两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家庭禀赋异质性

1.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影响家庭财务状况的重要因素,受教育年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家庭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从现实经验来看,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劳动力对新鲜事物的适应性更好,学习意识和认知能力更强,这无疑会增加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中的相对优势,从而增强家庭整体的风险应对能力。本文将家庭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方顺超、朱平芳,2024),分别引入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人数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进行分析。表8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二者与人均受教育年限交互项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劳动力流动对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家庭财务脆弱性存在更大的缓解作用,其原因可能是低人力资本家庭面临着更大的收入、失业等不确定性风险,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农村家庭更需要依托外出务工来获取稳定的收入来源,进而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降低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的概率。

2.社会资本

中国是一个社会网络高度发达的人情社会,家庭成员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或地缘为基础形成亲友联系网络,家庭的经济行为和投资决策也往往受到社会网络影响。由于大量信息和资源嵌于社会网络,家庭成员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或非经济收益。因此,社会网络具有信息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功能(章元、黄露露,2022)。家庭劳动力的就业决策行为与其嵌入群体的社会网络相关,很多农村劳动力正是因为亲朋好友的介绍才选择外出务工,深厚的社会网络也能显著降低农民工迁移的心理成本(颜银根,2020)。本文借鉴胡金焱和张博(2014)的做法,选取“家庭在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和红白喜事方面的现金或非现金收入与支出总和”取对数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表8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均显著为负,二者与社会网络交互项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的显著为正,这说明劳动力外出务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财务脆弱性,且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对高社会网络家庭的财务脆弱性抑制作用相对较小。换句话说,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对低社会资本家庭的缓解作用更大。这是因为低社会资本家庭由于缺乏足够深厚的社会网络来应对风险冲击,农村劳动力只能依靠外出务工来降低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

3.物质资本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家庭禀赋是个人能力的延伸,充足的物质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外出务工成员的迁移成本和心理成本,对缓解家庭经济风险存在积极影响。在受到风险冲击时,家庭的物质禀赋越高,抗风险能力越强,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小。本文以家庭资产的对数作为家庭物质资本的代理变量,引入劳动力流动与家庭资产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表8第(5)列和第(6)列的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对财务脆弱性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分别与家庭资产交互项的边际效应为正,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充足的物质资本能够有效避免家庭陷入财务困境,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对物质资本较

高的家庭财务脆弱性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物质资产匮乏的家庭会有更大的缓解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物质资本较高的家庭可以通过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或者经营性收入来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而物质资本较低的家庭只能通过外出务工获得劳动报酬,依靠工资性收入维持生计,进而抵御家庭经济风险。

表 8
 家庭禀赋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5)	(6)
劳动力流动	-0.1924*** (0.0171)		-0.1355*** (0.0107)		-0.3950*** (0.0468)	
劳动力流动人数		-0.1139*** (0.0105)		-0.0756*** (0.0063)		-0.2778*** (0.0273)
劳动力流动×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113*** (0.0018)					
劳动力流动人数×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065*** (0.0011)				
劳动力流动× 社会网络			0.0055*** (0.0015)			
劳动力流动人数×社 会网络				0.0026*** (0.0008)		
劳动力流动× 家庭资产					0.0233*** (0.0037)	
劳动力流动人数× 家庭资产						0.0172*** (0.0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455	42455	42455	42455	42455	42455
R ²	0.1011	0.1016	0.0969	0.0972	0.0971	0.0980

(二)家庭压力异质性

1. 赡养老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不断凸显,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使农村家庭面临的赡养负担逐渐加大。家庭中老年人占比增加不仅会减少劳动供给,同时还会增加家庭健康风险,削弱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农村家庭为应对老年成员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等意外支出,增强家庭赡养老人的负担能力,更加依赖于外出务工来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避免家庭陷入财务困境。参考仇化和尹志超(2023)的做法,本文使用家庭中是否有老年人作为赡养压力的代理变量。表 9 第(1)列和第(2)列为引入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分别与赡养老人交互项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分别与赡养老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分别在 1% 和 5%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需要照料老年人的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的概率更高。对于面临赡养压力家庭而言,外出务工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

2. 偿债压力

过度的债务负担不仅会加重家庭的利息偿还,还有可能导致家庭短期流动性困难,增加家庭债务的违约风险(李波、朱太辉,2020)。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家庭债务往往通过人际关系、亲戚朋

友等社会网络来建立联系。在个人声誉和文化、法制的压力下,农村家庭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负担。在这种社会网络的传导机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缓解偿债压力提供了重要支撑作用。本文借鉴张中祥和胡雅慧(2024)的度量方式,基于资产负债率这一存量指标测度家庭过度负债情况,将资产负债率高于50%的家庭视为过度负债家庭,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表9第(3)列和第(4)列为引入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人数分别与过度负债交互项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人数与过度负债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家庭的偿债负担,在过度负债引致家庭财务风险的过程中起到抑制作用。

表9 家庭压力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劳动力流动	-0.0949*** (0.0062)		-0.1003*** (0.0058)	
劳动力流动人数		-0.0561*** (0.0034)		-0.0572*** (0.0032)
劳动力流动×赡养老人	-0.0399*** (0.0137)			
劳动力流动人数×赡养老人		-0.0180** (0.0079)		
劳动力流动×过度负债			-0.0319 (0.0202)	
劳动力流动人数×过度负债				-0.0301*** (0.01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455	42455	42455	42455
R ²	0.0966	0.0968	0.0974	0.0978

七、进一步讨论

(一)务工距离

根据贾男和马俊龙(2015),本文按照个人户口所在地与常住地的差异对务工距离进行测度。如果家庭中存在农业户籍,户口所在地与常住地不一致,且从事非农就业的家庭成员,则定义为劳动力流动家庭。按照务工距离的差异,本文将劳动力流动类型具体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户籍地与常住地一致,在本乡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属于留守农村劳动力;(2)户籍地与常住地一致,但在本乡镇从事非农劳动的农业户籍人口属于本地农民工;(3)户籍地与常住地不一致,但在本县从事非农劳动的外乡镇农业户籍人口;(4)户籍地与常住地不一致,但在本市从事非农劳动的外县农业户籍人口;(5)户籍地与常住地不一致,但在本省从事非农劳动的外市农业户籍人口;(6)户籍地与常住地不一致,在外省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力人口。根据上述分类,将类型(2)的农户划分为本地农民工,类型(3)~(6)的农户划分为外地农民工。

表 10 汇报了不同务工距离与家庭财务脆弱性之间的估计结果。^①对于无劳动力流动家庭而言,不同务工距离的劳动力流动家庭都能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且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具体而言,县内流动、市内跨县、省内跨市和跨省流动分别使家庭财务脆弱性下降 4.63%、6.11%、7.89% 和 11.56%。进行组间系数差异 Suest 检验后发现,相近的两个务工距离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近的务工距离并没有真正导致农民工流入更高层级的经济地区。但相较于县内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的经验 p 值分别为 0.04 和 0.00,说明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比县内劳动力流动更能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证实了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比县内流动在财务方面更具优势。

表 10 务工距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县内流动	-0.0463*** (0.0134)			
市内跨县		-0.0611*** (0.0166)		
省内跨市			-0.0789*** (0.0109)	
跨省流动				-0.1156*** (0.01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2464	21971	23534	23930
R ²	0.1129	0.1120	0.1089	0.1130

(二)务工模式

对外出农民工而言,外出务工会比本地务工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但外出农民工往往从事危险系数更高、对身体健康危害更大的职业,同时还会加重留守劳动力经营农业生产的压力负担。对本地农民工而言,本地农民工可以帮助留守家庭进行农业生产,缓解农业生产负担对家庭财务产生的不利影响,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可能会无法得到保证,从而导致家庭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为考察不同务工模式对家庭财务状况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对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进行分析。

表 11 汇报了不同务工模式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估计结果。表 11 第(1)列结果显示,对留守农村劳动力而言,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表 11 第(2)列结果显示,本地农民工对留守劳动力家庭来说,家庭财务脆弱性显著下降 21.53%。表 11 第(3)列将外出农民工家庭与本地农民工家庭进行对比,发现外出务工家庭的财务脆弱性下降 2.02%,说明外出劳动力流动要比本地农民工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表 11 第(6)列的估计结果显示,相对本地农民工而言,外

① 由于 2015 年的 CHFS 中无法对家庭成员是否跨市流动进行精确定义,故表 10 只针对 2017—2019 年的样本家庭进行回归。

出务工的规模越大,家庭财务脆弱性越低。这可能与本地就业机会较少、就业质量不高相关,外出务工能够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和社会保障(李中建、袁璐璐,2017)。

表 11 务工模式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外出农民工(留守=0)	-0.2336*** (0.0099)					
本地农民工(留守=0)		-0.2153*** (0.0074)				
外出农民工 (本地农民工=0)			-0.0202*** (0.0066)			
外出农民工人数 (留守=0)				-0.1209*** (0.0047)		
本地农民工人数 (留守=0)					-0.1154*** (0.0033)	
外出农民工人数 (本地农民工=0)						-0.0251*** (0.00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16788	28029	27531	16788	28029	27531
<i>R</i> ²	0.1364	0.1292	0.0761	0.1391	0.1377	0.0775

八、结论和建议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的不断健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正在不断消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作为农户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降低家庭经济风险具有积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抑制作用。为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农民工就业视角探讨机制发现,劳动力流动能够通过增加就业数量、提高劳动力工资率和社会保障水平,拓展劳动力职业发展前景等方式降低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高人力资本、高社会资本和高物质资本的家庭来说,劳动力流动对低人力资本、低社会资本和低物质资本家庭的财务脆弱性存在更大的抑制作用。对于面临赡养老人和偿债压力的家庭而言,劳动力流动对维持家庭健康财务状况提供了强有力支撑。研究还发现,务工距离会对家庭财务脆弱性产生异质性影响,跨省流动和跨市流动比县内流动的家庭财务脆弱性更低。相比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抑制作用更强。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发挥劳动力流动的增收效应,改善农村家庭的经济风险。第一,畅通劳动力流动渠道,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就业,进一步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为农民工带来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第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保障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倡导设立乡村就业服务站点,降低外出务工人员的信息交流成本,促进外出农民工与工作岗位有效衔接。重视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职

业培训机会,以便农村劳动力能够从事高附加值的行业。第三,增强本地农村吸引力,多元化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优化农村就业环境,积极开发农村特色产业,引入高质量外来企业,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家庭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条件,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积极发挥社会帮扶的优良传统,为构建和谐乡村和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陈博欧、张锦华:《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财经研究》2021年第11期。
2. 陈媛媛、傅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劳动力流动与农业生产》,《管理世界》2017年第11期。
3. 仇化、尹志超:《数字化转型、信息搜寻与女性高质量就业》,《财贸经济》2023年第7期。
4. 崔岩、黄永亮:《就业技能与职业分化——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及其社会后果》,《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5期。
5. 方顺超、朱平芳:《互联网对于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5期。
6. 盖庆恩、赵文斌、王美知、胡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职业趋同:基本事实与影响机制》,《管理世界》2024年第4期。
7. 葛永波、陈虹宇:《劳动力转移如何影响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基于金融排斥的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3期。
8. 胡金焱、张博:《社会网络、民间融资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城乡差异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14年第10期。
9. 章元、黄露露:《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家庭储蓄率——来自中国城镇居民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1期。
10. 贾男、马俊龙:《非携带式医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锁定效应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9期。
11. 姜鹏飞、姜良杰、曹敏、唐少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中国软科学》2024年第S1期。
12. 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年第2期。
13. 李波、朱太辉:《债务杠杆、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脆弱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20年第7期。
14. 李博文、刘汉辉、展望、魏下海:《工会会员身份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统计研究》2021年第10期。
15. 李建勇、彭倩、黄宇虹:《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5期。
16. 李中建、袁璐璐:《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6期。
17. 刘林平、张春泥、陈小娟:《农民的效益观与农民工的行动逻辑——对农民工超时加班的意愿与目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9期。
18. 彭国华:《技术能力匹配、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差距》,《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19. 盛来运:《国外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发展》,《统计研究》2005年第8期。
20. 佟大建、金玉婷、宋亮:《农民工市民化:测度、现状与提升路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经济学家》2022年第4期。
21. 魏万青:《从职业发展到家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入户意愿研究》,《社会》2015年第5期。
22. 肖伟、刘文华、谢婷:《就地城镇化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23年第2期。
23. 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24. 颜银根:《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跨地区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1期。
25. 尹志超、刘泰星、张诚:《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期。
26. 岳威、王雄、张强:《健康风险、医疗保险与家庭财务脆弱性》,《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0期。
27. 岳希明、罗楚亮:《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与缓解贫困》,《世界经济》2010年第11期。
28. 张广胜、王若男:《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期。
29. 张冀、祝伟、王亚柯:《家庭经济脆弱性与风险规避》,《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30. 张中祥、胡雅慧:《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家庭过度负债?——基于主客观双重视角的微观证据》,《经济学(季刊)》2024年第2期。
31. 赵亚雄、王修华:《数字金融、家庭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兼论多维“鸿沟”的影响》,《金融研究》2022年第10期。
32. 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管理世界》1997年第5期。

33. Brunetti, M., Giarda, E., & Torricelli, C., Is Financial Fragility a Matter of Illiquidity? An Appraisal for Italian Household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62, No.4, 2016, pp.628–649.
34. Low, H. W., Self-Insurance in a Life-Cycle Model of Labour Supply and Saving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Vol.8, No.4, 2005, pp.945–975.
35. Nguyen, C. V., Berg, M. V. D., & Lensink, R., The Impact of Work and Non-work Migration on Household Welfar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19, No.4, 2011, pp.771–799.
36. Stark, O., & Lucas, R.E.B.,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Famil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36, 1988, pp.465–481.
37. Stock, J. H., & Yogo, M.,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 NBER Working Paper, 2005.

Labor Mobility an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YIN Zhichao, ZHANG A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00070)

Summary: As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rogresses, the barrie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abor markets are diminishi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a vital source of income for rural households, contribute to safeguarding labor rights, improving job quality, and mitigating family economic risk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bor mobility significantly reduces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compared with households without labor mobility, and this effect strengthens as the scale of labor mobility increases. To address potential endogeneity issues, such as reverse causality and omitted variables, this study employs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which confirms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A breakdown of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dicators reveals that labor mobil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otal household income, expected expenditure, and risk-free financial asset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unexpected expenditures caused by economic risks. This suggests that household income generated through labor migration is sufficient to cover unexpected expenditures, thereby reducing household financial ris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labor mobility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financial distress by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mproving labor wage levels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expanding career prospec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 of labor mobility on reducing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s greater for households with low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and physical capital than for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these capitals. For families facing the pressure of eldercare and debt repayment, labor mobility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m to maintain a healthy life and financial well-being.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distance of labor migration has a heterogeneous impact: compared with intra-county mobility, inter-provincial or inter-city mobility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reducing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Compared with local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workers relocating farther from home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reducing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Keywords: Labor Mobility, Employment Quantity, Employment Quality,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JEL: G59, J61, R23

责任编辑: 馨 兰